

曹操的寂寞

李国文等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曹操的寂寞/李国文等著.—北京:中国国际广

播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78-3311-9

I.①曹...II.①李...III.①中国—古代史—秦汉

时代—通俗读物②中国—古代史—三国时代—通

俗读物 IV.①K232.09②K23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第 233307 号

曹操的寂寞

著者: 李国文等

责任编辑: 刘东成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本: 640×940 1/16

字数: 197 千字

印张: 19

版次: 2011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3311-9/I·186

定价: 36.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直不疑的品行与时尚	1
两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儒	2
杨恽腰斩案	4
公孙弘	7
陈蕃的性格	10
张俭事件和名士的义侠之风	12
清议的句号人物孔融	15
儒生三传	17
祢衡、孔融、杨修之死	20
李氏兄妹	24
从《凤求凰》到《白头吟》	26
忍把浮名换钓丝（节选）	29
吕布与貂蝉	45
袁公路的皇帝梦	49
曹操的寂寞	51
曹操·能臣·奸雄	54
捉放曹	55
魏明帝生父之谜	59
魏吴的校事	61
曹操与张绣的恩怨	65
司马懿装病	67
刘备孙策托孤语	70
三种诸葛亮	72
挥泪斩马谡	74
魏延之乱	77
走出关帝庙	79
乐不思蜀解	85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87

小乔卸甲晚妆红	89
孙权的晚年	90
夏侯玄的风骨	93
何晏的学问、清谈和服药	95
第一个清谈名士之死	98
汉代铅笔考	100

直不疑的品行与时尚

何满子

《史记》有许多人物形象，太史公只用了草草数笔，就把性格写活了，使你读了永难忘怀。其中还有些并不算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让你保有深刻印象，不时闪现于脑际。而且深入思考，这些人物的特征还关涉到世风，辐射出时代。直不疑便是很有趣的人物，读时令人莞尔，读后成为记忆中的永存信息。

直不疑的事迹只有两百来字，附在《万石张叔列传》中。现抄录其前半段：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同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丢了钱，疑心是他偷的，这种诬枉不必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一般人都会生气、申辩，闹得不可开交，可是大度能容的这位好好先生，竟然也就认了，而且赔账。好在不久真相大白，否则就落得一个做贼的恶名，前途也就毁了。这种息事宁人的忍耐工夫不能不令人吃惊。旁人造他的谣，说他同嫂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如此丧人名节的诬陷，换个人就会火冒百丈，大动干戈。这位老先生竟毫不自明，只是平平淡淡地说，他压根儿就没有哥哥。没有哥哪来的嫂？釜底抽薪，这种不辩之辩，比声嘶力竭的争论高明得多，但这是需要修养到家，炉火纯青才行。

由此可知，编造、渲染男女关系来破坏人的名誉是自古已然的。汉初三杰之一的陈平，就有盗嫂之名，后人还引为典实，其实是冤枉的。《史记·陈丞相世家》说：

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瞧，陈平的嫂嫂如此憎嫌他，乃至陈平的长兄因此而和老婆翻了脸。但这一用私生活造谣的妙策最有人要听，噉噉喳喳，传播得最快。对方也很难辩白，愈辟谣愈糟。所以这心法久传不衰，比什么都灵。

直不疑对人诬他盗嫂，栽他盗金，一律涵容，不辩白，乃至说他偷就认贼，乖乖地赔钱，其行为近于迂怪。这当然是常人之所难能，但这样的性行也是世风之所染。汉初文景之世，朝廷好黄老之学，唯宁静谦退是尚。要做官取高位，就得表现出冲淡退守、息事不争的派头来。这样，直不疑才能以长者著称，官至御史大夫，封列侯。如果在提倡士可杀不可辱，匹夫被侮，拔剑而起的年代，直不疑这样的行为就会被视为瘟生、冤大头了，谁还给他官做？

两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儒

何满子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个打着儒家招牌、把异端思想引入周孔之学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的人：一个是西汉的董仲舒，一个是北宋的程颐。这两个人对中国文化所起的消极作用，严重点说，可说是误尽苍生。

世人概论汉宋之学，都说汉儒重训诂，宋儒重义理。这只是治经学路数的区别，与运用学说无干。治训诂、考据，不过是就经论经，大抵是做学问的行当；解经解错了不过是解经解错了而已；后人可以据经文来核对是非。即使完全解释错了，比如注“黑”字曰：“黑者白也。”对经邦济世，国计民生也无关紧要。讲义理则要关系到学说的宗旨，直接影响到治国平天下；儒家学说恰好又正是政治伦理学说，封建王朝是以它为准则来统治臣民的。义理一有偏差，就毫厘千里，害死人了。

董仲舒偏偏是在训诂之学盛行的西汉独搞义理的。他治的是《春秋》学，“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史记·儒林列传》）他将天人感应这一套阴阳家的玄虚之谈引入了儒学，说白了就是搞迷信。《春秋繁露·精华》中就说了这样的鬼话：

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朱丝而胁之，为其不义也。……

诸如此类的义理充斥于他谈述《春秋》大义之中。周孔思孟之学大体是讲人事的，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却将儒学祖师所瞧不起的阴阳巫觋那一套引入儒学，假儒学以行之，开了东汉以后的图数讖纬之学的盛行。程颐所称颂并汲取的邵雍的《皇极经世》这套推算历数的道士式的玄学，正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发扬。

董仲舒的时代，佛教学说还没有传入。他只能从阴阳家这类土生土长的迷信中找材料附会入儒学，使儒学驳杂化、玄学化而贻害儒学千余年，后世的儒者和儒学，天人感应说成了排除不了的附骨之疽。到了程颐手里，佛教那套更高明的唯心主义玄学已在中土盛行，比土生土长的那套迷信言诡而辩得多了。程颐于是将它改头换面地偷偷塞进他的天人性命之说，自诩是孔孟心传，振绝学于千载。但他的欺世盗名，还是瞒不过明眼人。金朝人李纯甫的《鸣道集说》中就一语破的地将他揭穿了：

伊川诸儒（程颐兄弟为今河南伊川人，故称伊川或伊洛学派）虽号深明性理，发明六经圣人之学，实皆窃我佛书者也。（刘祁《归潜志》引）

程颐所偷的主要是禅宗明心见性之学，程朱等人连聚众讲学、论著用语录体那一套也从禅宗窃来。甚至编出来的自神其术的故事，也是从禅宗拷贝过来的，如有名的“程门立雪”故事。

程门立雪的故事是朱熹《朱子语录》吹出来而成了儒林佳话的，后来成了无人不知的熟典。说是杨时（即程颐的护法弟子龟山先生）、游酢两人初见程颐，程颐瞑目而坐，两人不敢惊醒他，侍立一旁，气也不敢吭。程颐老半天醒来，说：“你们还在么，走吧！”两人一出门，门外已经积雪盈尺了，云云。这个故事是偷禅宗二祖慧可向禅宗中土开派人达摩禅师求道的传说的，只改了一下名字。天下文章一大抄，儒家抄到了和尚头上去。程朱之徒口口声声排斥僧道异端，剿袭人家不知脸红，真是虚伪透顶。

杨恽腰斩案

金性尧

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 54 年）的杨恽腰斩案，是中国文字狱的滥觞。

杨恽，字子幼，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的外孙。为人刚强梗直，轻财好义。当时一些值宿卫的郎官（中郎、侍郎、郎中之总称），均须执戟宿门外，号为轮流，实则须出钱送礼，才能得到文书出外。时人以山为出产财货之所，故称为“山郎”。按照规定，郎官五天可得到一次休沐，如逢病假满一日，就要扣除一天的休沐，有的人因而终年不得休沐，有钱的虽非休沐也可出外游戏。有的买通主管官吏，得了“善部”。于是贿赂流行，争相仿效。杨恽为中郎将（皇帝近侍官之长），革其弊，并罢“山郎”。令行禁止，由是擢为光禄勋（九卿之一）。

但他性忌刻，喜欢发人阴私，有与他相忤的，必欲害之，因而与太仆（亦九卿之一）戴长乐有嫌隙。宣帝在民间时宣帝少年时曾养于祖母史良娣家，即与戴长乐相识，即位后乃拔擢亲近。戴长乐曾与宣帝至宗庙演习祭祀的礼仪，回来后对人说：“我亲面见受诏，副（助）帝肄（习），侯御（金赏为他御车）。”有人上书告发：戴长乐不当说这种话（确实不当说），案发至廷尉。戴长乐疑心是杨恽主使，便也上书告杨恽之罪，罪名有好几条，这里就说四条。

左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杨恽上书替他雪冤。郎中丘常对恽说：“闻君侯（恽曾封平通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答曰：“事何容易，胫胫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窰数者也。”胫胫、真人都是正直者的意思。窰数（即“窰藪”）是戴在头上的顶物之器，意思是老鼠洞太小，不能将窰数穿过洞穴，当是汉人的谚语。

韩延寿是一位贤太守，被杀之日，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进酒食，人人饮酒。延寿使掾史分谢送者：“远苦吏民，延寿死无所恨！”百姓无不流涕。杨恽替他雪冤并没有错，当时还允许吏民为罪犯公开诀别，等于为韩延寿开盛大的追悼会。延寿的三个儿子从此不愿做官。

杨恽上观西阁上画的人像，指着桀纣对乐昌侯王武说：“天子过此，一一问其过（失），可以得师矣。”画像上还有尧舜禹汤，却偏举桀纣。为什么只举坏人不举好人？杨恽之意，只是要皇帝从桀纣身上得到儆戒。戴长乐在告发中却说：“恽妄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

杨恽又对长乐说：“‘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东矣’。以主上为戏语，尤悖逆绝理。”夏侯君指夏侯胜，他曾对已废的昌邑王刘贺说：“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河东有后土祠，皇帝每年必往祭祀。这话当是杨、戴闲谈时，当作戏话来说的，这时却成为罪名了。

宣帝将此案发交廷尉于定国审理，定国以“大逆不道，请逮捕治”奏闻，宣帝不忍处以死罪，下诏降恽与长乐为庶人。

杨恽失爵位家居后，却还治产业，造房屋，以财物自娱。后来友人安定太守孙会宗以书相戒，书中有“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惧，为可怜之意，不当治产业，通宾客，有称誉”语。

杨恽的旷废，心里自然不会服气，见了孙会宗的信，恰好给了他一个出气的机会，便写了一封复信。信中满腹牢骚，一身怨气，先说自己家里隆盛时如何如何显赫，到了今日，“过已大矣，行已亏矣，长为农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意当复用此为讥议也”。信中的“公上”指皇帝，意即今后只想务农度日，将耕桑所得以充皇家的赋税而已，这话已是冷嘲的了。信中还有这样一首诗：“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是影射朝政败坏，种了一顷豆，一会儿便零落成为萁，表现出他对朝廷的绝望情绪。

杨恽的侄子安平侯杨谭，曾对杨恽说：“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过出，今征为御史大夫。侯（指杨恽）罪薄，又有功，且复用。”杨恽说：“有功何益？县官（天子）不足为尽力。”恽素与盖宽饶、韩延寿友好，杨谭便接上去说：“县官实然，盖司隶、韩冯翊皆尽力吏也，俱坐事诛。”恰巧有一天是日食，有一个管喂驹卒马的小吏名叫

成的，便告发说：“日食之咎，此人所致。”古人把日食看作灾异，宣帝看到杨恽致孙会宗的信十分恼怒，廷尉即以“大逆无道”罪将杨恽腰斩，妻子流放酒泉郡。杨谭降为庶人，和杨恽有交情的未央上尉韦玄成、京兆尹张敞和孙会宗皆罢官，那个叫作成的小吏却召拜为郎，也许出于他的意外。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司马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广汉）、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议贤议能，若广汉、延寿之治民，可不谓能乎？宽饶、恽之刚直，可不谓贤乎？然则虽有死罪，犹将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此论甚公允，亦令人有“汉文有道恩犹薄”之叹。

宣帝的太子刘奭（即后来的元帝）柔仁好儒，看到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于侍宴时向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几欲疏太子而立淮阳王刘钦。

这里再说一说杨恽的那篇《报孙会宗书》。

这也是西汉文中的白眉，和他外祖父的《报任安书》媲美，经《文选》与《古文观止》收录后，万口传诵。两文皆以抒情见长，杨文后段，尤诗情欲溢，风土如见。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八云：“愤口放言，不必又道，道其萧森历落，真为太史公外甥。”《古文观止》评云：“太史公外孙，其报会宗书，宛然外祖答任安书风致。辞气怨激，竟遭惨祸。宣帝处恽，不以戴长乐所告事，而以报会宗一书，异哉帝之失刑也。”但杨恽以大逆罪被杀，而班固却将他的传记载入《汉书》中，并多美词，又全录其《报孙会宗书》原文，否则，后人便无法得见。古代史官直道治史的高风，犹得于此见之。

公孙弘

扬之水

汉儒多出在齐鲁，做了博士，乃至二千石官的，也不少。公孙弘是齐人，虽然读书读得晚，却终于以布衣取相位，因此班固把它作为汉武帝“明明扬侧陋”，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而这样的际遇，在中国历史上，是常常被称作“异数”的。

本传说：

公孙弘，菑川薛人也。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

十年以后，弘再次以贤良文学被征。武帝策诏诸儒，出的题目，与此前招考董仲舒等人的，大抵相同。弘的答卷，比起仲舒，似乎差得远。班固记这一段经过说：

时对策者百余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只好说是圣心莫测了。不过，所谓容貌甚丽，倒好像是当时取士的一条不成文的标准。如汉相中的田千秋：

长八尺余，体貌甚丽。武帝见而说之。

另一位王商：

商为人多质有威重，长八尺余，身体鸿大，容貌甚过绝人。

又如武帝宠臣江充：

初，充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禅衣，曲裾后垂交输，冠禅步摇冠，飞翾之纓。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

因此东方朔上书自荐，除了自称学书学剑，勇、捷、廉、信无一不备之外，还要特别表述一番容貌，即“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而这“选美”的来源，又似乎可以追溯到汉初，如“状貌如妇

人好女”的留侯张良，“为人长大美色”的陈丞相平，及《张丞相列传》记：

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

如此，大概可以推知，体高大，肤白皙，目有神，便可称作“容貌甚丽”。那么这位七十老翁之“丽”，大约就是“欹而长兮！抑若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语出《诗》中的《齐风·猗嗟》，正是“本地风光”。

总之，这齐地山河育就的天生资质，初见之下，就给了武帝一个好印象，也助成这一番“君臣际会”。

弘少为狱吏，中年读经，老来登进，七十年的人生阅历，使他已经很懂得如何在官场中转圜腾挪。本传写道：

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廷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为臣不忠。”上然弘言。

这是很精彩的一笔。就此也便点出他后来所以做了丞相，又所以终丞相位的奥秘——武帝一朝，丞相而善终者，是不多见的。

弘为人以“曲”，为官以“曲”，为学，亦以“曲”。他的业师辕固生，似乎早已窥见端倪。还在初征贤良的时候，固已经在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但先生所讲的，只是为学与做人的道理，却不能指给一条飞黄腾达的路。而在这一点上，“公孙子”是另具一番眼光的。也许是有了第一次入仕受挫的教训吧，这一回，他却很能够揣摩上意了——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但他的尊儒，却绝不是甘愿屈尊于儒学之下，所谓“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即用儒学来改造自己，治理国家，而是要将儒学置于权力之下，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

汲黯曾谏武帝不可轻易诛杀人才。“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

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对待人才已是如此，何况学问？“独尊儒术”几十年之后，宣帝朝的硕儒夏侯胜已经可以这样教育弟子：“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拾地芥耳。”不言掌握经术之后，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方法，而曰一旦明经，就可以轻取富贵，儒学的改造，不是很见成效了么。汉武帝远比秦始皇聪明，他巧妙地将儒学与政治的结怨，变为结缘。成就此功的关键人物，董仲舒之外，当推公孙弘。只是仲舒犹在讲学问，弘却只是将学问改造成帝所用的“术”。《汉书·食货志》云：“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传》言弘“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不能不说是史家的洞见。

除此之外，弘的相业，可以称述的似乎不多。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一件，大抵算得善政。但他其实又是嫉贤妒能之辈，据《董仲舒传》：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为谗，弘嫉之。胶西王亦上兄也，尤纵恣，数害吏二千石。弘乃言于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又向武帝进谗，族主父偃，皆此类。那么，这“开东阁以延贤人”，也如同他的衣布被、食脱粟饭一样，不过饰诈钓名而已。

弘非治国之才，武帝也看得明白。不过他早招致一批明经有辩才的文士在近旁，朝廷有议不能决，便命这些侍从之臣来行驳难。如弘为御史大夫的时候，以为不便置朔方郡，帝便命令朱买臣等人和他辩论，以致“发十策，弘不得一”。又弘在宰相位时，曾奏言“禁民不得挟弓弩”，则为吾丘寿王所诘难。买臣、寿王，都是武帝的亲幸之臣。

但这种做法，却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对此，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有一段很尖锐的批评：

……至孝武自用一种私人与宰相相抗衡，而群臣不间新进疏远，更进用事，享国即久，遂以成俗。末年犹甚。至宣帝，魏（相）、丙

（吉）号为名相，不以左右近习不能有所为。其后侍中、待诏之流，毁誉成败在其口，大臣束手退听……

他的锋芒所指，并不在后来搅乱朝政的天子宠臣石显、董贤之流，而是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初因。在天子一言定鼎、威行天下的时代，不论君子还是小人，行恶行善，都是需要由这位最高权力者，为之提供一个特别机遇的。在正常的行政制度之外，另辟途径，希图以个人的天才加权术治理国家，最终只能够给国家带来灾难。

陈蕃的性格

何满子

陈蕃(95? ~168)在当时“海内希风之流共相标榜”的名士品题中，被尊为“三君”之一。“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后汉书·党锢列传》)另二君是窦武与刘淑，这两人其实是因缘际会的人物，在文化史的意义上没有什么分量；窦武号为三君之首，只是一个政治人物。三君以下，才是“人之英”的“八俊”，即李膺、杜密等辈；其次是“能以德行引人”的“八顾”，即郭泰、范滂等辈，是汉末名士中最典型、最能代表清议人物风采的人物；“能导人追宗”的“八及”，即张俭、岑等辈；“能以财救人”的“八厨”，即度尚、张邈等辈。在清议名士的这个名单中，陈蕃不但是当时为人所宗也是后世凛凛然有生气的人物。

陈蕃少年时就有“名士风流大不拘”的派头，虽然还不到魏晋放诞之士那样衣服也不换洗、脏到长虱子而扞虱清谈的地步，但环境卫生确是很马虎的，不打扫庭院便史有明文，《后汉书》本传道：

蕃年十五，尝独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以后来的行状看，他确不是大言欺人以掩小失。他的生活细节中更有名的事是他不接待宾客，宅中连多余的床榻都不准备。他经李固表荐，朝廷征为议郎，迁青州乐安太守，“郡人周，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为置一榻，去则悬之。”（本传）这条记载不是孤证，《通鉴·汉纪四十六》还有取自袁宏《汉

纪》的一条：“陈蕃为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宾客，唯（徐）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这条因为王勃写进了《滕王阁序》，大家读熟了“徐孺下陈蕃之榻”这句滕王阁所在地南昌的典故，所以更为人知。

用“方峻”一词来形容陈蕃的性格，实不足以尽之，应该说是苛严。史载，他任乐安太守时，郡中有个叫赵宣的，此人葬亲之后不仅遵礼守庐墓三年，而且在墓道上掘了一个坠室，在地下室里服孝二十多年。地方上争称他的孝行，州郡对他很为礼敬，将他的卓行向陈蕃称荐。陈蕃接见了，问到他的家事，知道了赵宣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孝中诞生的，勃然大怒道：《礼记》上说“三年之丧，可复父母之恩也”。又说：“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你守丧二十多年，天天祭，已经不合礼的规定，而且竟在守丧期中生儿育女（也就是在理当哀戚的丧期中与妻子过性生活），岂不是欺世惑众，亵渎鬼神！立即把这个伪君子法办。

方峻而至于苛严，性格就不免刚烈，近乎他的举主李固所说的“峣峣者易折”的品性。当时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炙手可热，派使者致函有所请托，陈蕃一点也不买账，他比李固做得还要绝。李固是你请托归请托，我依法办理照样依法办理；陈蕃则连梁冀派来的使者也拒而不见，使者诈以他事来见，陈蕃怒而答杀之。治乱世，用重典，要“扫除天下”，就得如今语所说：“动真格的。”陈蕃真有他的。

梁冀当然不是好惹的，于是他被贬为修武县令。此后入朝任尚书，还是我行我素，公卿们廷议征讨“山贼”，下诏举孝廉、茂才，他都要上疏批驳，说小民作恶，罪在官吏侵暴，武力不能解决，要澄清吏治才是；朝廷人员已经够多了，择善用之，简恶去之就行，何必事事下诏，开进之路？一顿驳，驳得公卿同僚人人侧目，只得把他外放作豫章太守，免得碍事。诸如此类前后以谏诤直切而触怒皇帝，或以办事不留情面而得罪权势，多次被免职或黜降。但威望则愈来愈高。《世说新语》开卷第一条就写的是他：“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德行》）刘注引《海内先贤传》云：“蕃为尚书，以忠正忤贵戚，不得

在台。”与不容于权贵的同时，京都太学生们则奉为圭臬。当时在朝任官而有天下重望的，就数他和李膺、王畅，《后汉书·党锢列传》道：

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由于负天下重望，他几次被谪降，三次免职，朝廷迫于輿情，仍不得不一再起用，从尚书令、大鸿胪、光禄勋、尚书仆射做到三公之首的太尉，最后拜太傅，录尚书事。身为朝廷柱石，不断和宦官斗争，党锢事起，李膺等被下狱审讯，陈蕃以“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切谏，宦官们恨之切骨，也因为他是朝野具瞻，不敢害他，策免了事。他再次起复后，痛感不除阉宦，国无宁日，决心与窦武协同剪除宦官。事泄后，也是他自己闯上去在宫中被害的。他死得十分壮烈，他的悲剧不但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直士的命运悲剧，更是性格悲剧。他被尊为“一世之宗”，确实由于他堪为清议名士的“直之风”的代表。

张俭事件和名士的义侠之风

何满子

陈在第一次党锢案时是自动投案的，遇赦释放；第二次大概由于张让的保护获免。他的儿子中最出名的两个，即所谓“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的“难兄难弟”一典的当事人之一，哥哥陈纪，也在党禁名单中；陈谌早死，是否也遭党禁莫考。荀淑死时（公元 149 年）党事未起，李膺曾为之服丧三年；他的儿子中，“八龙”之最后的荀爽是“遭党锢，隐于海上，又南遁汉滨，积数十年”，长期流亡过的，荀爽的两位堂兄弟在党锢案中一死一囚，同父的其他兄弟七人是否株连入案，史无征。这两家人都是冲淡平和，并非金刚怒目式的激昂之士，尚且逃不脱检举、告密、诽谤、罗织的大网，则张俭这样举劾诛戮了中常侍侯览之母的出头椽子，其命运就可以想见了。

张俭（公元 113 年？~公元 197 年？）的名气大极了，第二次党锢案就冲着他爆发的，但《后汉书·党锢列传》只记了他劾杀侯览之母一事，名士称号中列入“八及”之首，他之何以能如此风靡天下的事迹却未著录，传文末尾的论赞道：

……张俭见怒时王，颠沛假命，天下闻其风者，莫不怜其壮志，而争为之主，至于捐城委爵，破族屠身，盖数十百所，岂不贤哉！

关于张俭窘迫亡命，望门投止，重其名行而破家相容的事倒是记了多起，情节也相当动人。如他逃到东莱，躲在李笃家里，外黄令毛钦领兵到李家搜捕，李笃发话道：“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毛钦为之感动，怪李笃独行此仁义之事，而不让他也分担点神圣光荣的义务，叹息而去。张俭就在李笃的掩护下辗转逃出塞外。

又如孔融兄弟，因孔融之兄孔褒与张俭是旧交，张俭投奔孔褒，后者不在家；孔融年方十六，张俭因他年少而不敢自明，孔融见他有惶窘之色，勇敢地留藏了这个朝廷钦犯。不久事泄，两兄弟和母亲三人，还演了一场挺身争担罪责的壮剧，以至郡县都无法定案，一直上报到朝廷才决定归罪于孔褒。在张俭的逃亡途中，因掩护他而“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党锢列传》）。

因惺惺相惜，忘身家之祸而救护同类的这类行为，又显示了东汉儒流另一特色，一种近似西汉朱家、郭解之流的侠士之风。李固、杜乔被害后门生故吏冒死收尸的壮举亦属于此类，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的是何颙。

何颙就是后来赏识曹操、认为“安天下者必此人也”的那一位。他年轻时游学洛阳，与郭泰、贾彪等人交好，显名于太学。他的友人虞伟高有父仇未报，而患疾不起，弥留时何颙前去探视，虞向何泣诉这一平生恨事，何感其义，虞死后为之代报其仇，将仇人的头颅祭亡友之墓，简直就是一篇义侠故事。

何颙在党锢案中也做了不少好事，《党锢列传》中道：